

中国 当代 小说 史稿

——人物形象系列论

409 俊贤 著

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行之、毛承志
封面、扉页设计：廖宝珠

中国当代小说史稿

Zhongguo Dangdai Xiaoshuo Shigao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frac{3}{8}$ 插页 3

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02-000830-5/I·831 定价 4.70 元



作 者 像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综论	7
一 中国当代小说的两次繁盛	8
二 系列的延展与变革：中国当代小说的演进 特征	25
第二章 形象系列论	48
小引	48
一 农民形象系列	54
二 军人形象系列	86
三 工人形象系列	114
四 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138
五 干部形象系列	166
六 形象系列的总体审视	192
第三章 形象系列艺术表现论	207
一 小说内涵的衍化	207
二 人物形象的真实化趋向	220
三 人物形象体系的功能及演进	233
四 结构观念的更新及实践发展趋势	250
第四章 形象系列审美意识论	267
一 崇高的歧途与复归	267
二 觉醒与彳亍：新时期的悲剧小说	283

三 当代小说表现优美与幽默	296
四 新时期小说审美意识的复合状态	307
结束语	321
后记	325
再记	329

引 言

中国当代小说是一个流变的实体，正向日渐宽阔广大的境界流动。应当说它已走过一个显著的较为完整的历史过程，构成作为当代小说发展史的相对独立阶段。基于这一事实，我们获得了对它进行整体审视的可行性基点。

当代小说成败得失的丰富实践，也启示与期待着小说研究的整体概括与新的开拓；同时，它又为这一理论工作提供了现实的思维对象。人的实践的自觉意识性，天然地要求理论指导。实践的扩展与深化，要求理论概括向广度与深度开拓。轻薄小说理论研究，或者只重视对具体小说作品的直感判断（这当然是必要的），而否定抽象概括的必要与价值，这种近视的目光，狭隘的经验意识，实际上主要是小生产者思维积习的反映。对中国当代小说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理论研究，总结其发展的规律，探索其发展趋势，这有可能为小说评论的发展与小说创作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参照资料。

进行小说创作或小说研究同所有的其他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人们一样，对文学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总会有一个或此或彼、或明或暗、或正或误、或深或浅的认识。这种基本认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文学观。由于文学自身在时空上的无比广阔，由于它是一种精神现象，由于它的复杂性与神秘色彩，由于它的流动不居，也由于认识者的自身状况，这就形成了文学观的见仁

见智、众说不一。可以说，从事文学的人各有各的文学观。这并不是说人们的文学观不可以归类分析，而是说它具有无限丰富性，有发展变化的无穷天地。也许，它会象美的本质问题一样，难以得到定于一尊的结论。

事实上，这种见解纷纭的状况不仅在通常状况下是一种必然现象，而且，它也有益无害。无论如何，这比武断的、肤浅片面乃至谬误的天下大一统的认识要好得多。不同的文学观的存在与出现，是艺术探索与科学进步的正常现象。也许经历过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会有可能形成一种或几种较为深入的基本观点。但是，这种大体统一的局面终究也是暂时的，随着文学的实践发展，又将出现新的各执一端、见解不一的文学观点。

至于我个人，对于文学的认识则是经历着由浅入深、由狭窄到宽广的过程。看来，我们对文学、对小说应该持宽容对待和严格要求的双重态度。我们应该赞成文学、小说的多元化、多样化，也应该赞成它们的多层面化。文学、小说有高层面的，有中间层面的，也有低层面的。不管它们处于哪一个水平层面，只要对人民是健康有益的，都应持欢迎态度。因为它们可以满足不同层面精神消费者的需要。我们赞成多层面文学、小说的存在，并不等于赞成它的静止与封闭。我们希望不同层面的文学、小说都致力于提高自身的价值，以形成不同层面交融共处、共同提高的新格局。

总览文学、小说的历史与现状，我认为，文学、小说就其总体的实质而言，是人性及其灵魂的完美建构。

人性及其灵魂的完美建构，这是一个历史范畴。历代的小说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它，各自在自身和历史许可的范围内，完成了自己表达人性及其灵魂的完美建构的艺术使命。在

历史的流程中，人物的灵魂建构不只在数量上增长，而且从质上看，呈现为螺旋式的上升趋势。这种状况的形成，不只是由于小说家艺术经验的积累与才智的增长，也由于表现的对象“人”的灵魂日趋多变与复杂。

人性及其灵魂的完美建构，这又是一个逻辑的范畴。小说中人物的灵魂建构，是感情、理性与形象的融合物。它既是历时性的，又是共时性的。它囊括了人类人性及其灵魂的所有历史积淀，也饱和着同时代人性及其灵魂的现实内容。

作品中人物的灵魂，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地反映或摹写出客观社会中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灵魂，它必然是人物灵魂与作家灵魂相融合而铸成的新建构。诚然，在不同流派的作品中，这种融合会形成各有天地的不同形态。

所谓人性及其灵魂的完美建构，并不是要求人物的人性及其灵魂在政治与道德上完美无缺，而是从审美意义上提出的要求。即使是丑恶的灵魂，经过审美观照与艺术处理，也可以构成美学意义上的完美灵魂，也就是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灵魂。人物灵魂的完美性，是指人物的人性及其灵魂的无限丰富性、无比深刻性与不可重复的独特性。

从文学、小说的天职看，人性及其灵魂不仅要具有审美功能，而且要具有社会认识功能。往往这二者具有背离倾向，但它们并非是天然的两极对立。理想的境界，应该是二者的和谐一致。这显然是对文学、小说的整体而言，并非对每一个具体作家或具体作品的要求。从我们的国情与读者的欣赏需要、习惯而论，我们的文学应该同时强化社会认识功能与审美功能，并强化二者的统一。这种强化必须置于尊重小说家主体创造性的基点上，否则将可能导致小说创作的单一与僵化。

对于文学史、小说史的研究工作者来讲，在明确自己的文学观念之后，又面临着一个选择、寻找和创造撰写体例的问题。在这里，研究者所面对的课题是：研究的视角、论著的结构与论述的模式。

传统的以编年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包括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散文史等），在文学研究、教学领域作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现在和将来仍将不失为基本模式之一。但是，毫无疑问，这并不一定是文学史的最佳模式，更不是唯一模式。在文学创作与批评日益多元化、多样化的今天，文学史的研究也呼唤着同步的自我“超越”，呼唤着多元化、多样化的新探索。

拙作是史论结合、概括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史的专著。它不重在描述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与现状的表象，而旨在较深的层次上，从不同侧面揭示中国当代小说的内在结构形态、发展流向及其与有关事物的本质联系，从而，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整体探析。

在我看来，人物形象系列的演进是中国当代小说三十五年来发展的核心。人物形象系列的横向延展与纵向拓进，体现着中国当代小说的主导流向与实质。人物形象系列的派生物，构成中国当代小说的丰富的多侧面。对人物形象系列及与其相关的艺术表现系列、审美特色系列的综合与分析，将有助于实现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总体把握与深层解析，也将有助于对文学的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的探求。因之，本书将依据这一逻辑结构展开多侧面的研究与表述。

拙著以中国当代小说的总体为研究对象，但它不同于传统撰写方式的小说史，不追求对每一部在文学史上占据地位的小说作全面、完整的评价，不追求对论述对象复盖面的广度，不追

求对当代小说流变全程的详尽考察，而是采取典型解剖的方法，从总体俯瞰与纵横探析的角度，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统一，宏观与微观结合。所论及的作品以满足命题与说明事理为度。诚然，命题是对小说作品整体在不同层次与侧面上的概括，具有其客观依据与完整性。

小说创作实践的发展与小说观念的刷新，要求小说理论工作者变革自己的研究方法。对小说运用评点式的方法去研究，这既是研究者目光与读者欣赏趣味的反映，也与其时的小说创作实践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小说重在追求社会政治内容的时候，小说批评趋向社会的、政治的批评，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小说沦为某种政治的奴婢或荣宠为鹰犬的时候，小说批评蜕变为棍子以至反动的说教，这也是必然的归宿。

我国古代的小说评点，重微观探幽，而缺乏宏观把握；习惯直感判断，而缺乏理论概括与思辩色彩。“五四”以来及至“文革”前的小说研究，有了长足进步。研究者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对具体小说作品和具体小说家的研究取得了成果。但若从文学整体去看，这种研究依然处于微观层面。新时期开始出现宏观的综合的小说研究，虽然仅仅是开端。但毕竟是良好的开端，因为在研究视野上有大的拓展，在观念与方法上有大的革新。当代小说研究从微观走向宏观，这是小说研究家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小说研究走向独立的征兆。这说明，小说研究从小说作品的附庸得到“超越”，而形成独立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本书的理论基础。本书的研究方法，采用历史辩证法指导下的系统论与结构主义。对于传统的方法论，有所继承，对于新的方法论，有所吸收。诚然，方法论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是克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矛盾的一种手段，

而不是目的。至于系统论与结构主义，也只是在方法论上的借鉴与使用，这与作为一种思潮的结构主义是毫无关系的。

在我看来，作为方法论，系统论、结构主义对于人文科学研究会发生有生命力的效应。但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属于意识形态，超历史的方法论可能使研究走向歧途。为了导引研究工作的正确航向，必须借助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系统论、结构主义可以帮助人们从某一角度揭示历史（包括文学史、小说史）的流程。但它不能全面地、深刻地涵盖历史，而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则全面涵盖着历史，当然它并不等同于历史。因此，它成为研究历史的可靠指南。

无论历史辩证法，还是系统论、结构主义，我将它们作为方法论，也主要是以它们为思维的方式，运用它们的基本原理观察与研究当代小说流变的历史，而绝非机械套用它们的原理，更不是滥用它们的术语，以博风雅。因此，如果以系统论、结构主义的定义、定律逐一“对照检查”或圈套拙著，将会招致失望的结论。

拙著论述作品的范围，主要是1949年至1984年期间公开发表的小说，对近年来所发表的某些作品在必要时也有所涉及。

第一章 综 论

中国当代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干。它以其思想艺术成就、对读者的强大吸引力与广泛的社会效应，雄踞文坛，而与文学的兄弟门类如诗歌、散文、文学剧本显示出伯仲之别。从艺术典型的追求与艺术表现力的发展角度去看，中长篇小说常常标志着我国当代小说的水平，也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它对其它艺术门类，诸如电影、戏剧、舞蹈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中有举足轻重的显赫地位。

小说曾经被人们理解为故事的叙述或者对某一问题的阐释（所谓“问题小说”）。六十年代以后流行的一种观点则是：它在表现人物的命运。这些（以及其它）表述，各自从不同角度与深度上说明着小说的特质。但是，小说创作实践在演进，人们关于小说的观念也不能不流变。

以历史的眼光看，小说家的追求，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并永无止境地运用形象手段探索自然、社会，特别是人的心灵的运动奥秘。从总体和根本上说，小说基本上是人的灵魂之学。人的灵魂无非是各呈个性化形态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反映物、化合物。探索人的灵魂的学科并非一家。小说作为人的灵魂之学，它的不可取代处在于：它是以情感为血液，以形象为载体，以思想意识为主导，以个性化为形态，对人的灵魂进行一次带有整体性的再

创造。

中国当代小说是中国近现代小说的扬弃；中国当代小说是世界当代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探索人的灵魂的路途上，当代小说比起它的前辈来，有了长足的进展。小说创作显示出活跃的、千姿百态的、开放的态势；小说家们在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不同层面、不同区域，选用不同的思维手段与艺术表现方式，从事创造性的艺术劳动。

一 中国当代小说的两次繁盛

当代小说和人民共和国一同在古朴的华夏大地上生长。它如同竹木花卉，历经几度枯荣，顽强地走向茂盛。

中国当代小说起步于四十年代末，经过五十年代初、中期的酝酿准备，五十年代末开始形成长篇小说的繁盛局面。这一局面一直延展到六十年代初。与此同时，中短篇小说也有程度不等的演进。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衰落，六十年代末期与七十年代初、中期出现了小说创作的荒芜。经过七十年代末期的复苏与新生，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出现了中篇小说的繁盛。这种发展趋势尚在持续。

五十年代末的长篇小说繁盛

军事小说充任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先锋。新中国诞生的礼炮轰鸣前后，刘白羽的《火光在前》、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徐光耀的《平原烈火》以及杨朔的《三千里江山》^①等中长篇小说散发着战火硝烟的气味降临文坛。而柳青以保卫延安战争的沙家店战役为题材的《铜墙铁壁》^②，由于

思想积极、结构完整，塑造了较为鲜明的石得富的英雄形象，在这类军事小说中，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与较为突出的成就，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回顾历史长河，我们发现：这些军事小说除过自身的价值之外，它们还为1954年中国文坛上诞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英雄史诗《保卫延安》作了文学准备。从某种角度说，没有解放初期的这一批军事小说，就不可能有《保卫延安》，最低限度说，就不可能有如此规模与水平的《保卫延安》。

《铜墙铁壁》的作者柳青评论《保卫延安》时讲：“这部书给我们立了个新水平。”^③同是反映保卫延安战争的长篇小说，无庸讳言，《保卫延安》较之《铜墙铁壁》，在文学进程上的跨度，至为明显。

文学评论家冯雪峰对《保卫延安》作出高度的科学估价。他说：“《保卫延安》的出版，从我们文学工作上说或从人民的文艺生活上说，都是有重要意义的。”^④

《保卫延安》全面地大规模地状写了可歌可泣的保卫延安战争。它对这一题材采取展现全局、正面强攻的艺术处理，力争从较深的层次上揭示这一题材所包孕着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及其种种具体形态，谱出一曲人民英雄的赞歌与人民战争的胜利进行曲。因之，长篇的内容宏大、丰富而深刻。

① 《火光在前》，刊《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开不败的花朵》，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10月版；《新儿女英雄传》，《人民日报》自1949年5月25日起连载；《平原烈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5月版；《三千里江山》，刊《人民文学》1952年10月号。

② 《铜墙铁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9月版。

③ 柳青：《颠倒不了的历史》，《延河》1979年第2期。

④ 冯雪峰：《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14、15期。

《保卫延安》塑造了一批真实、生动的英雄形象，周大勇是英雄群像中的杰出者。长篇所塑造的人民军队高级将领彭德怀的形象，是当代文学画廊中具有首创意义的、不可多得的贡献。

独创的内容要求独创的结构。《保卫延安》内容之广、之深、之独特，促使着作家在结构上作出新的探索。这部长篇取我国古代小说和欧洲小说章法之所长而熔于一炉，形成了具有个性特色的独特结构。

《保卫延安》的题材、内容、英雄形象塑造、以及结构所取得的成就，这一切说明它在新现实主义创作征途上有了长足的进展。诚如冯雪峰所论断：“这部作品在英雄史诗上的成就在我们创作上就有一种新纪录的意义；它的显著的创造性，显然有推进我们现实主义创作运动的作用。”^①

《保卫延安》面世之后不久，我国第一部表现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刊行。^②《三里湾》敏锐而有力地表现了人民内部矛盾，它从农民的婚姻恋爱、家庭伦理、邻里关系以至生产关系，反映了农业合作化的复杂性、艰巨性。作家的笔触幽默风趣，深为读者，尤其是农民读者所喜爱。此前，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也在文坛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当代小说创作起了推进作用。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讲，《保卫延安》、《三里湾》以及其它长、中、短篇小说为五十年代末的长篇小说繁盛进行了思想的艺术的酝酿与准备。

这次长篇小说的繁盛起始于1957年。这一年，长篇小说《红

① 冯雪峰：《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14、15期。

② 《保卫延安》，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里湾》，《人民文学》1955年1至5月号连载。

旗谱》、《红日》、《林海雪原》、《我们播种爱情》及《百炼成钢》等纷纷出版,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和《水滴石穿》也在刊物发表。这一繁盛的局面在持续。1958年,《青春之歌》、《山乡巨变》及《上海的早晨》刊行于世。1959年,《创业史》发表。《三家巷》、《红岩》先后于1960年、1961年出版。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印行。此后,长篇小说的繁盛局面基本结束,开始走向衰落。

在这争奇斗妍的花苑中,《红旗谱》与《创业史》是具有代表性的佼佼者。这一时期,或稍早一些,一大批优秀短篇小说,烘托与扶持了长篇小说的兴盛景象。例如:《洼地上的“战役”》、《黎明的河边》、《李双双小传》、《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新结识的伙伴》、《卖菜者》、《普通劳动者》、《百合花》、《达吉和她的父亲》、《延安人》、《锻炼锻炼》、《三年早知道》^①等。

与解放初乃至五十年代初期相比较,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量与质出现了明显的突进。作品反映生活的领域有所扩大,工厂、农村、部队、学校,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民主革命以至封建王朝时期均有所问津。然而,从题材的角度讲,取得丰硕成果的是民主革命与农业合作化生活。《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三家巷》以及《红岩》等长篇小说,为光耀千古的民主革命谱写了一部悲壮英勇、神奇真实的英雄交响乐;《创业史》、《山乡巨变》,南北对峙,格调迥异,为农业合作化绘制出两卷新美的历史画卷。

① 上述小说的著者及发表时间依次为:路翎,《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峻青,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李準,《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王蒙,《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王汶石,《延河》,1958年第11期,《延河》,1959年第10期;王愿坚,《北京文艺》,1958年8月号;茹志鹃,《延河》,1958年3月号;高缨,《红岩》,1958年3月号;杜鹏程,《文艺月报》,1958年5月号;赵树理,《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马烽,《火花》,1958年1月号。

这次长篇小说的繁盛，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最主要的功绩是创造了一批艺术典型，特别是朱老忠、林道静、梁三老汉、梁建等艺术典型的诞生。

在艺术典型创造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得到发展并走向深化。

如果说《保卫延安》推进了我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业史》则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新发展。《创业史》提炼与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社会的、伦理的、心理的矛盾冲突。在反映同类生活的作品中，它的内容呈现出巨大的容积与凝重感。《创业史》对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具体描写、细节描写，尤其是对于某些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达到前所未见的精确地步。它在我国推进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

在《保卫延安》中，作家倾注着主观愿望与革命激情，初步显示出浪漫主义色彩；及至这次长篇小说繁盛时期出现的《红旗谱》、《红岩》等作品，则焕发着更为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小说家的热情融入形象与具体描写，英雄人物为光明和真理展开的殊死战斗，小说家的革命理想在作品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

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与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以卓然不群的风姿，显示出现实主义深化的趋向。

所谓现实主义深化，是在特定条件下现实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向。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作家“除熟悉生活以外，还要向现实生活去突进一步，……如何表现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看出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更深地去认识、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复杂斗争，更正确地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作家的新的任